

THE FOOTPRINT OF A VETERAN DIPLOMAT

WANG BINGNAN AS I KNEW HIM



一位老外交家的足迹

我所知道的

王炳南

第一部

人民出版社

程远行 著

一位老外交家的足迹
我所知道的
王炳南

第一部

程远行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春林 魏 华
封面设计:尹凤阁
版式设计:马 杰
责任校对:阎 忿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位老外交家的足迹
——我所知道的王炳南(第一部)/程远行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2
ISBN 7-01-002734-X

I. 一…
II. 程…
III. 王炳南-生平事迹
IV. K827.7

一位老外交家的足迹

——我所知道的王炳南(第一部)
YIWEI LAO WAIJIAOJIA DE ZUJI
—WO SUO ZHIDAO DE WANG BINGNAN

程远行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博诚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年12月第1版 199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94 毫米 1/32 印张:11.125
字数:220千字 印数:1-8000册

ISBN 7-01-002734-X/K·564 定价:1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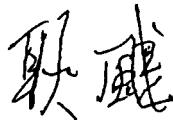
序

王炳南同志是我国外事工作的先驱者之一，他参与西安事变、重庆谈判、马歇尔三人小组谈判、中美大使级谈判，还参加过多次官方和民间的国际会议，为中国的外交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

王炳南同志也是我党统战工作的先驱者之一，在30、40、50年代，他在各党派爱国人士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为我党的统战工作建立了卓越的功勋。

我和王炳南同志在外交部和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共事多年，彼此甚为了解。程远行同志将王炳南同志的一生写出来，并介绍给广大读者，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我很支持。

我祝愿《一位老外交家的足迹》一书早日出版。



1996.6.26.

前　　言

王炳南的一生是同我党的奋斗历程联系在一起的。1925年，他加入共青团，次年转为中共党员，一直为党的外交和统战事业辛勤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为贯彻中央的对外政策，他在几十个国家留下了光辉的足迹。

1936年，王炳南奉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之命，从德国回到西北军杨虎城部做统战工作。他曾作为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的牵线人参与了西安事变，为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9年，王炳南奉调武汉，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国际宣传组负责人。长江局撤销后，他在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任外事组组长。重庆国共谈判时，他担任毛泽东的秘书。1946年，他在中共中央南京局担任外事委员会副书记（书记是周恩来），后在西柏坡担任中共中央外事组副主任（主任是叶剑英）。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驻波兰大使、外交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等职务。在漫长的革命、外交生涯中，他历尽艰辛和坎坷，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珍贵的足迹。人们称他是我党统战工作和外交工作的先驱者之一。

从王炳南的活动经历可以看出，我党我国的外交史早在30年代末期就已开始。从王炳南的足迹可帮助我们和后人对新中国的

外交史有进一步的了解。尽管由于种种原因，他只是位副外长，但他的外交经历却是我国外交史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篇章。

王炳南曾是第一届、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委员、外事委员会委员；还曾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我离休后，走访了一些朋友。在我们交谈中，都一致认为王炳南是我党不可多得的外交家，是新中国外交的创始人之一。认真研究他的经历，对进一步了解我党外交工作的成长、发展是极为有益的。

王炳南的品德、工作和为人也给他的朋友和晚辈们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大家一致认为，王炳南朴实谦和，嫉恶如仇又古道热肠，待人诚恳，没有架子，无论是对外还是对内，无论是在谈判桌上，还是在和朋友促膝交谈，他都是娓娓而谈，情意恳切，因而他的朋友很多；他是个乐观派，无论是处在顺境，还是处在逆境，他一贯从容不迫，信心十足；他有能力，有才华，留学两个国家，是位胸怀豁达的外交高手，但他从不妒忌别人；他刚直不阿，爱憎分明，从不随声应和，东倒西歪；他廉洁奉公，不搞特殊化，他对自己是如此，对子女的要求也是如此。他把个人的一生奉献给党、奉献给祖国和人民，唯独没有想过自己。他在留下的遗嘱中写道：“回首平生无憾事，只恨许多有益的工作还没有做完。只要同志们想起我时，说一声：‘是个好同志’也就满足了。”

诚然，人无完人，但仅就王炳南的品格、为人和他对祖国对人民的忠诚及奉献，就足以成为我们的楷模。

32年前，在王炳南家的客厅里，我建议将他那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整理出来，供后人参阅。他欣然接受。但他强调说：“我不能突出个人，我曾在毛主席、周总理和叶帅身边工作过，如果在工作中有什么成就，首先应该归功于他们。”由于政治形势骤变，爆发“文革”，就把这件要办而不便办的事搁了下来。他虽然在9年前

已与世长辞，但 32 年前，他和我谈写回忆录的神容、语调、内容依然清晰如昨。

我曾担任过王炳南的秘书。1963 年，王炳南由波兰回国任外交部副部长。由于他主管苏联、东欧地区，便向干部司提出，请为他选一个懂俄文的秘书。结果我被选中了。这也是我的幸运，能在他的身边工作。自那时起，从外交部到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我先后在他身边工作了近 8 年之久。多少年来，他对我的影响很大很大，对我的指导、帮助很多很多。特别是在他处于逆境、被关在外交部地下室时，还担心我是否受到株连。当我靠边站的时候，他除了同情我的遭遇、不满当时的作法外，还主动将我调到他手下工作。患难见真情，他对人这种真挚之情，使谁也忘不了的。

我写此书有四个目的：一是如实地介绍王炳南的一些往事，供后人评说；二是了却王炳南本人生前要写一本书的愿望；三是不辜负王炳南的妻子姚淑贤、长子王黎明、次子王东明、四子王波明、义女顾惠芬、侄子王德明以及他生前好友之重托；四是我已年近古稀，力争将我了解到的他，用我这支拙笔写出来。有一天，当我告辞人世时，我将满意地告诉自己：“我该感谢的人，我感谢了！”

在此，我衷心感谢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耿飚同志为本书写序。

本书是依据我接触王炳南所了解的情况和他遗留的日记、年表、大事记等文字资料、有关史料和他的亲友所谈的情况写就的。在写作过程中曾请王光美、杨拯民、梅益和田健等同志提出宝贵意见。本书脱稿时，承蒙夏大明等同志阅过有关章节。人民出版社李春林同志和魏华同志都对本书下过很大功夫。在此，对以上诸位深表诚挚的谢意。

作 者

1997 年 6 月于北京

目 录

序	(1)
前 言	(1)
第一章 祸从天降	(1)
“我想把今天发生的事全都告诉你”——“我深信，最后还是会还我一个清白的”——我党外交工作的一件憾事	
第二章 少年时代	(8)
“耕读传家”——惊人的记忆力——“这句话好像是一盏明灯”	
第三章 参加革命	(16)
17岁入团——组织农民抗税——“首先想到的是党是最了解自己的”——得到于右任的赏识	
第四章 留学日本	(30)
杨虎城说：“我想送你去日本留学，将来回来搞革命更好”——“三人居”——东京脱险	

DJ11/33

第五章 留德五年	(40)
转入德共——担任中国语言组党支部书记——会见台尔 曼——目睹希特勒上台——季米特洛夫的至交——与安 娜利泽结婚——受命回国		
第六章 西安风云	(60)
路经莫斯科会王明——“杂志请寄回来”——送斯诺去延 安——杨虎城、张学良的中间联系人——参与西安事变 ——安排史沫特莱采访杨虎城——穿梭于张、杨、周之间 ——杨虎城的最后重托		
第七章 从上海到武汉	(108)
任宋子文水利委员会的专门委员——拜访何香凝、宋庆 龄——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国际宣传组组长——接送白求 恩赴延安——陪同周恩来会见斯诺——组织我党 30 年代 最大的外事活动——迎送柯棣华——安排伊文思为纪 录片《四万万人民》补拍镜头——三件事——周恩来说： 炳南不仅是我的右手，也还是我的耳朵和嘴巴——“新升 隆”号遇险		
第八章 重庆岁月(上)	(133)
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外事组组长——广交朋友——披露皖 南事变真相——“我至今怀念约瑟夫·沃伦·史迪威”—— 组织“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安排“美国军事观察组” 访问延安——任中共重庆工委候补委员——周恩来委任 的“上校秘书”——开展统战工作——组织“救国会”—— 成立“小民革”——冯玉祥家的常客		

第九章 重庆岁月(下)..... (179)

重庆谈判:毛泽东43天的秘书——陪毛泽东会见陈立夫、戴季陶——“沁园春·雪”重庆流传始末——毛泽东会见“小民革”——一次成功的活动——“毛主席不忘旧好,不忘旧情”——民间外交的典范——为释放张、杨而奔走——初会马歇尔——三人小组

第十章 南京谈判 (247)

梅园新村:18年后的回忆——任中共中央南京局外事委员会副书记兼秘书长——周恩来说:我和董必武不便出席的外事活动,都由王炳南代表——亲自为张家口外语学校招生——中共代表团的发言人——参加与马歇尔、司徒雷登的谈判——马歇尔急访周恩来——“月宫盗宝”的故事——送马歇尔离华——负责南京办事处工作——坚持不赶不走的原则

第十一章 回延安 (322)

受到毛泽东接见——参加土改——任中共中央外事组副主任——组织研究美国在华的经济问题

第十二章 进北平 (329)

参加国共和谈——协助召开政协会议——结束“小民革”——筹组外交部

第一章 祸从天降

“我想把今天发生的事全都
告诉你”——“我深信，最后
还是会还我一个清白的”——
我党外交工作的一件憾事

1966年春，华夏大地正孕育着一场前所未有的风暴。

北京城中心的东郊民巷15号，原是清朝饶余亲王之四子、第一代安亲王岳乐的府邸，如今这座北京城内仅存的外观完好的王府殿宇，静静地迎来了它的新主人。由于邢台地震的影响，外交部决定，部领导暂时搬到东郊民巷15号的主楼办公。经过一段时间的整理，部长和副部长们开始进入新的办公室工作。

这天刚上班，陈毅副总理兼外长的秘书石国宝来电话通知外交部值班室：“老总上午9时到外交部，召开党委会。”

“开会什么内容？”

“到时候就知道了。”石国宝回答得很简单。

上午9时，陈老总在秘书官恒政的陪同下，大步走进了主楼。他没去自己的办公室，就直奔会议室。中午，会议结束了，各位副部长陆续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最后出来的是陈老总和王炳南。

王炳南拖着沉重的步子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心情好像很压抑。他坐在沙发上，陷入了沉思。我预感到有什么严重的事件发生，但

又不便去打扰他。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仍然保持着原来的姿势。我轻轻地走过去提醒他：“该吃午饭了。”

王炳南这才注意到我在他身边。他看了我一眼说：“远行，坐到这里。我现在非常需要跟人谈谈，我想把今天发生的事全都告诉你。”他也没有看我的反应，对我，又似乎对他自己说：“刚才的党委常委会上，陈老总传达了一项总理的决定，从明天开始将停止我的一切外事活动。”

“这又从何说起呢？”我有些不知所措。

“你知道我的老朋友董竹君吧，就是原来上海锦江饭店的那个女老板，现在是全国政协委员。”

“知道。”

“她有个女儿董国瑛^① 从美国回来，有人说她是国际间谍。”

“国际间谍？”

“我和她们都很熟，去她家看过她们几次。对此，康生、谢富治向总理反映，怀疑我向她们泄露了外事机密，还建议停止我的一切对外活动。”

“这一切是康生的主意了？”

“不是他还有谁会这样捕风捉影。”他接着对我说：“刚才散会时，陈老总还单独跟我说：‘这样也好，你可以有充分的时间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不要背包袱，要实事求是。具体的情况我们不了解，但董竹君是爱国的民主人士，我们应该尊重她，没什么原则问题不要随意去怀疑人家。’”

“对呀，陈老总在上海时不是也认识董家母女吗？”我补上了一句。

^① 董国瑛，1920年生于四川成都，1942年参加革命，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任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导演。

“他们都认识。”

“那他们凭什么怀疑你泄露了国家机密呢？”我不解地问。

他斩钉截铁地说：“我和董家母女没有谈过任何外事机密，怀疑是没有根据的。”

“那不是瞎怀疑吗？”我替他不平。

他说：“泄露机密的结论就是凭着怀疑作出的。”

停了一会儿，他又接着说：“我从明天开始就不来这里上班了，如果方便的话，你多抽出一点时间到我家来。我们好好谈谈看怎么个检讨法。”他用坦诚的目光望着不知所措的我。我毫不迟疑地说：“我在你身边工作了这么久，‘四清’时还在江苏同吃同住了半年多，你该了解我。有什么事，或者抄抄写写什么的，我会全力去办好的。放心，我去你家。”

他把日常用的文具收拾好，走出了办公室。

我望着他步履蹒跚的样子，内心有一种难以名状的酸楚。好心人劝他不要背包袱，但实际上这个包袱将永远地让他背了下去。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恢复他外交部副部长的职务，而他自己也再也没有回过他那间副外长的办公室。

这天晚上，我到了史家胡同王炳南的家。这座不大的北京四合院，对我来说并不陌生。院内格局和建筑风格仍保留着老北京原有的风格。门柱漆红，房檐挂绿，屋顶的琉璃瓦深绿油亮，显得古色古香。院内西侧有从苏州移来的青竹，院中央还有一棵参天的枣树。树下有石桌和藤椅，可谓幽静典雅，大方不俗。

王炳南的妻子张裕云出来迎接我。我们边走边谈。她说：“康生就喜欢搞小动作，是个整人的能手，毫无根据地怀疑这个有特嫌，那个有海外关系，就是他根红苗正，一贯正确。炳南跟随周总理几十年，长期搞外事，还搞过统战工作，接触董家母女还需要请示你康生不成？我看他是别有用心。”

王炳南坐在书桌旁，在思索着什么，见我来了，忙起来招呼我。看上去他的情绪比我想像的要好得多。他依如平常，让我也感到轻松了许多。

书房里只剩下了王炳南和我时，他说：“我们相处的时间已经不短了，彼此也有了一些了解。我感到你不是一个落井下石的人。我对你是信得过的。我把你当做知心朋友。从今天起，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我想和你讲讲我的过去和现在，从工作到生活，从粗到细，有些我保留的文件也给你看看，让你能全面地了解我。同时我也想借此机会对我的过去做个剖析。这样你对我个人所发生的一切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我当然愿意听听他的往事。自到他办公室工作以来，一直为他的平易近人所感动。他是位慈祥的长者。我绝对不相信他会是坏人。现在莫名其妙地被停止了工作，我非常着急。希望能尽快结束这样的审查，还他一个公道。所以我是怀着急切的心情，想帮助他做点什么。当我看到他仍然像往常一样靠在沙发上，和颜悦色，神态平静，好像这天没发生过任何意外，这就更使我确信，他是冤枉的。

周总理亲自下令停止王炳南的对外工作，这对王炳南说来，应该说是祸从天降。停止对外工作，虽然不是什么处分，也还不是什么处理结论，但此事和国际间谍挂上了钩，在通常情况下，是很不容易交待清楚的。即便是交待明白了，那康生是否会让你轻易过关，也难预料。因此，我在到王炳南家之前，一直认为，这一如同泰山压顶的大灾难，对任何人说来，都有些不大好招架。我为他担心。

王炳南对我说：“不必担心，我愿意接受组织上的审查。我长期在周总理身边工作，周总理是了解我的。我也很了解总理。总理对身边的人和较亲近的人要求很严格，同时也很爱护。当然，我

不会由于总理了解我而对今天发生的事掉以轻心，但也不会由于康生、谢富治的举报而垂头丧气，因为我没有任何泄密行为。康、谢所提出的怀疑是没有根据的，而且董竹君是位有贡献的民主人士，是我党的统战对象。董国瑛虽然去过美国，但她不是国际间谍。因此，我可以大胆地说，今天发生的问题是一件很容易说清楚的问题。”

我听后，松了一口气，而且被他那种诚挚和自信所感染。他对这天发生的事没有流露出更多的怨言，更增加了我对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的蔑视和愤慨。

王炳南继续对我说：“这些事不必动情，不必动气。坦率地说，这种审查在党内常常发生。这并不是一件坏事。通过审查可以让组织上更加了解我。这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考验。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是不怕这种考验的。我这个人在历史上不止一次碰到这种毫无根据的审查和考验。康生也不止一次像这样通过组织来找我的麻烦。组织上也不止一次地通过审查，又还给我一个清白。”

“在我个人的历史中，我接受过多次审查。例如我长期在杨虎城将军那里工作，后期曾任杨虎城将军的代理人，由于工作需要曾和国民党军方人物都有过密切的来往。因而，就有人对我这段历史有过不必要的怀疑。还有一件事是前妻王安娜。她是德国人，离开生活条件十分优越的故乡，到中国来投奔革命，在中共领导下，积极参加反法西斯的斗争。她在周恩来同志亲自指导下，从西安到上海，由上海到武汉、重庆，都是勤勤恳恳地为中国共产党、为抗日工作，并为我党的对外宣传、民间外交和支前等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而党内有人提出王安娜是国际间谍，从而也对我进行审查。”

就王安娜有间谍之嫌使王炳南受株连一事，王炳南和我说：“在抗日战争期间，我军的医药补给相当困难，除从日军手中缴获

一点外，其余很多必需的药品器材都要到蒋管区或沦陷区的城市去购买，但往往事倍功半。周总理为此大伤脑筋，于是他让王安娜深入到日本侵略军占领区为我军采购药品。因为当时德意日轴心国联盟已经形成，王安娜可以利用她德国人的身份潜入日本占领区。这一点她是得天独厚的。有一次，王安娜冒着风险到日本占领的上海采购药品，一个偶然的机会，遇见了一位曾在德国同过学的日本人 K 博士。王安娜通过 K 博士不但顺利地搞到了许多急救药品、医疗器材，而且 K 博士还答应帮助运出上海。在上海期间，王安娜应 K 博士的邀请，乘一架军用飞机到东京游逛了 4 天。这件事就给她以后在中国的处境埋下了一颗苦涩的种子，有人就怀疑她是国际间谍。”

王炳南对妻子被怀疑是国际间谍的问题，在以肃清反革命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中，写了很多说明材料也被认为是交待不清，参加了多次说清楚会，总有人说他包庇妻子，不让他“过关”。最后，还是由于查无实据而不了了之。

王炳南接着对我说：“不论是对我个人历史的审查，还是受王安娜的株连，不论是专门对我审查，还是参加整风运动，我都是处之泰然。我扪心自问，自从 1925 年入党以来，忠于人民、忠于党，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我没作过一件对党、对革命、对人民事业不利的事；我对人对事肝胆相照、光明磊落。我承认，我是有缺点有错误的，但我没有任何值得专门审查的问题。我作为一个党员，接受组织上的审查，允许人家怀疑。可我深信，最后还是会还我一个清白的。历史问题的审查是这个结局，王安娜问题的审查是这个结局，董国瑛问题的审查，也将仍然是这个结局。”

王炳南的这一席话，使我消除了不少疑团，不仅不再为他今天的事担心和着急，反而对他传奇式经历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在交谈中，王炳南向我谈了他个人的工作简历。从他少年离

家到日本、德国留学，从西安到上海、武汉、重庆、南京、延安和北京等的全部活动，他都作了介绍。王炳南很会讲话，他记忆力强，所谈内容思路清晰，形象生动。同时，他还讲毛泽东、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几十年中给他写的亲笔信件，都一一交给我仔细阅读。这是一批十分珍贵的文献资料，内容是在重大的历史阶段里，有关外事工作的重要指示，并有对王炳南过去工作的肯定和鼓励。从这些文献中可以看出，他在我党统战工作和外事工作中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有着不可低估的功勋。这批珍贵文献被收藏得如此完好，外人难得一见。

王炳南长时间地、断断续续地自我介绍，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我对他的功绩肃然起敬，对他对党和人民的忠诚所感动，对他谦虚谨慎、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的美德所心服。

后来王炳南“里通外国”的嫌疑，也以查无实据而不了了之。虽然对这一莫须有的罪名，王本人并没有耿耿于怀，但由此未能让这位外交部的好当家继续发挥作用，这不能不说是我党外交工作的一件憾事。